

张光直作品系列

Kwang-chih
Chang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中国古典学术文库

张光直作品系列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张光直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 张光直著.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3.3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185-2

I . ①中… II . ①张… III .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 ①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1810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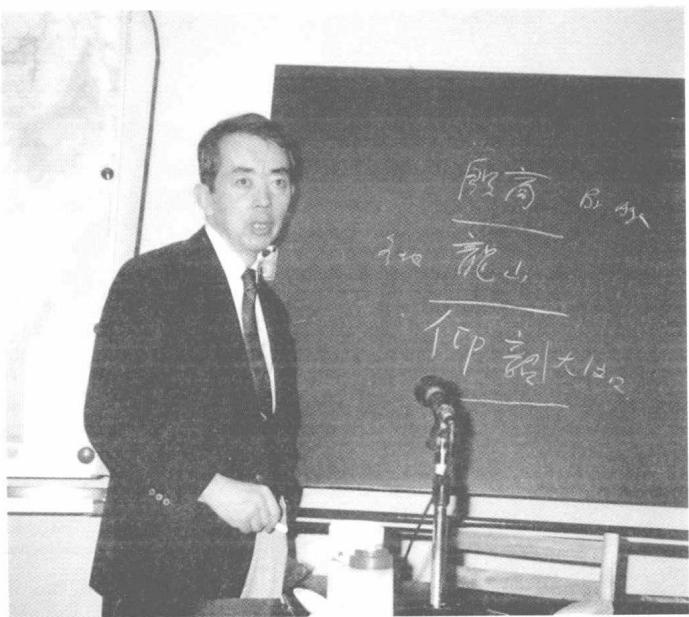
字 数 310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60.00元



在台湾大坌坑遗址发掘，1964年



在台湾大学讲学，1994年



与来自海峡两岸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合影，麻省剑桥，1996年

東亞原始文化史研究及其主要問題

張光直

亞洲東部（中國、朝鮮、日本、西伯利亞、及東南亞）雖有中國的輝煌歷史學上的成就，對其原始文化的科學探究則是較近的發明。作為研究原始文化史之科學的文化人類學（考古學與民族學），在東亞區域，首先由西歐殖民者輸入，應用於東南亞，復與東漸的各種西學一起傳入日本與中國。文化人類學家在東亞區域有系統的搜集資料，大約始於十九世紀的末葉，到今才不到一百年的曆史。對已搜集到的資料之整理研究及一般適用性之理論的建設，則除了在若干區域有嘗試外，就東亞一體而言，幾乎尚未開始。

謹慎的學者常說：作東亞文化的綜合研究，“現在還深到時候”。換言之，“資料尚未齊備”，所以不能著筆。謹慎本是科學問的起碼條件，資料更是作研究的基石；但這話也可以從民族學方面來看個別的。頂要緊的一點，就是資料也許永遠沒有“齊備”的一天；至少對東亞來說，數代之內的

前 言

这本书所收的 19 篇论文，是我从 1950 年加入考古行列四十多年以来用中文所写的文章里面，除去已经收入《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二集）的以外，慎重选择出来的。最早的一篇发表于 1957 年，此后有 1959、1960 年各一篇，1977 年的两篇，其余的都是近几年所写的。我所写的考古学专著，都是用英文写的。我自 1955 年就一直住在美国，自然要用英文写书。在期刊中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一样。但在这 40 年中，我一直没有与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界失去联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我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民族学研究所的集刊上发表了不少中文写的论文。自 80 年代，大陆上的几个学术刊物登载我的考古文字。我用中文写的论文，是和国内的同行学者交流学习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我也可以说是国内学术界的参与者，我的著作在国内考古学的发展上，也可能起过作用。所以这本论文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可以算是一段记录。另外我还用中文写过许多综合性的考古论文，因为新材料和新研究，已经完全过时了，就没有收入本书。

不过，我还是收进来一篇过时的文章，它已经完全不能代表我今日的看法了。这就是第四篇，发表于 1959 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在这以前，中国考古学者相信在新石

器时代有两个平行的文化，仰韶在西，龙山在东。50年代，有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掘，在遗址上层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就叫做庙底沟二期文化，似乎是从仰韶到龙山的转变期的一种文化。1959年，安志敏和石兴邦两位先生在北京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10月号上面，我在台北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共发表了3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出来一个内容很是相似的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关系的新解释，即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起源于豫西、晋南和陕西关中地区，然后发展成为龙山文化，向东扩展到山东和沿海地带。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新石器文化发展史的理论。那时大陆和台湾之间还没有接触，所以这三篇文章不谋而合地达到同样的结论，可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巧事。不久，大陆发生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运动，考古工作中断，这个所谓“核心地区起源说”的理论，在国内外便一直是嗣后十余年内的主流理论。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碳素14数据逐渐发布，使我们知道核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不比“边缘”地区为早，同时大汶口文化的地位在山东确定了下来，证明虽然河南的龙山文化可能是从仰韶文化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的祖先却可以在大汶口文化里找到。这样一来，核心地区起源说很快地便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被“区域文化多元说”所取代。这篇文章今天虽然已经不再适用，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收入本书，使读者看看在三十多年以前，考古学者在当时所知道的材料的基础之上，考虑了什么问题，用了些什么方法，怎样得到这个在考古界称雄一时的结论。本书里没有收入有关区域文化多元说新理论的文章，因为我对这新说还没有用中文写过，但从第七篇论文《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读者可以看到我较近的看法。

其他的十几篇论文当然也有时代的限制。例如《“浊大计划”第一期考古工作总结》里面所讨论的台湾中部史前文化的序列，今天不用说已有更新的材料，必须加以补充。但这篇文章的意义是跟着“浊大计划”的历史性而来的。关于“浊大计划”的历史意义，还没有人详细地讨论过。我有一篇叫做《追记台湾“浊大计划”》，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一书中，读者可以参阅。

有关三代考古的文章，都已收入《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二集）。

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给李济之先生身后在大陆第一次出版的学术著作所写的《编者后记》，也是我对李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的讨论的一个尝试。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之父，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建树详细讨论的文章，还很少见。我希望这篇跋语在这里发表，能够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李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上所做的事太多了，还需要有人做进一步的研究。

目 录

前 言	1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1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10
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	30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	44
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113
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	133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148
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	186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	202
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	223
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	255
“浊大计划”与1972年至1974年浊大流域考古调查	275
浊水溪大肚溪流域考古	
——“浊大计划”第一期考古工作总结	309
圆山出土的一颗人齿	347

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	353
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366
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	380
殷墟5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代问题	397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	412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在“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这一个大题目的下面来讨论考古学，我们至少要牵涉到三个小题目：（1）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建设上有没有考古学的地位？（2）如果考古学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话，有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3）考古学的建设是不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上面能够作出重要的或甚至是独特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我就这三个小问题直抒己见。

一 人类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

把考古学放在人类学里面的这种做法，是美国的习惯。美国考古学上有句名言，说“美洲的考古学便是人类学，不然它便什么都不是”。这种看法是适合美洲考古学的现实的。美洲的人类虽然至少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但除了中美的玛雅文明以外都没有文字记录，而且即使玛雅的文字记录所包括的范

* 原载陈国强主编《建设中国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

围也只限于历法的记录与片段的王朝历史。西方文明自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便逐渐进入美洲，美洲的土著文化逐渐缩减，但直到今天美洲土著文化还是活的文化，是人类学者研究的对象，所以研究美洲考古的学者便不能不从人类学者研究的结果与资料出发。

旧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情况与美洲大不相同，所以人类学、考古学这些学科在学术分类系统中的地位也就大不一样。首先，旧大陆的考古学是在历史科学的温床里产生出来的。爱琴海古典文明的考古，是 19 世纪后期德国人谢里曼根据荷马的史诗在特洛伊奠基的，而中北欧最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 19 世纪后期的地质学家在地质层位里辨认出来的。在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基础是建立在金石学上的，而金石学一向是史学的一个分支。

旧世界人类学的产生，不论是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都是与西方文明的工业革命（18 世纪中叶），与继之而产生的全世界的殖民活动分不开的。当西方工业文明伸展到亚、非及大洋洲与拉丁美洲时便与土著民族接触，当即强烈意识到其人种上与文化社会上的分歧性，而人种学与民族学又成了学术上与行政上的需要，因而促成了这些学科在 19 世纪的发展。这些学科传入中国也是在欧洲通过翻译开始的。据芮逸夫的记述^[1]：“最早的一部书是德国人写的《民族学》，其书出版于 1898 年。两年后，英国人洛伊将其译成英文，称为《文化人类学》。我国的林纾和魏易二人又将其从英文译成汉文，称为《民种学》，并于 1903 年（清

[1] 芮逸夫《民族学在中国》，《大陆杂志》3 卷 7 期，203—206 页，及 3 卷 8 期，251—255 页，1951。

光绪二十九年）由北京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官书局出版发行。但同年满清政府学部订颁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在文学科大学各门学科‘中外地理门’主课中，则将其称为‘人种及人类学’。”

既然旧世界学科系统中考古学与人类学来自不同的渊源，那是不是就说在人类学的讨论当中应当没有考古学的地位呢？学科的区分只不过代表我们对学术界内一种分类系统的认识，它是有时代性的，因为学科的分类系统是经常变化着的。20世纪初期在中国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古学并不是不可以20世纪的末期独立起来或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的，这主要得看从事考古学的人对自己学科的新了解、新认识与新的分类。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从业者必须做一番细心的检讨。讨论的焦点应当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考古学与人类学（在这里当指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密切结合起来对考古学有什么益处？对人类学又有什么益处？

因为人类学家能够观察和分析现代的活的社会，它能够把社会当做一个系统性的有机体来研究，能够了解这个有机体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甚至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类型，所以人类学所分析出来的人类社会的有机系统性的构架也有种种不同的类型。换言之，人类学供给我们人类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蓝图。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在这两点上要比没有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占有优势的地位：第一，他很自然地把考古资料当做“人”的活动遗迹来看而不仅仅当做器物本身来看。第二，他知道要把考古遗物拼合起来从而复原古代文化社会，而其中哪些蓝图是可供参考的。后面这点有时会有人误以为用考古的资料去凑合人类学的理论，其实这是一

种根本的误解。用考古资料来复原古史，我们最终的依据还是资料本身，而绝不能把某种人类学的理论奉为教条，拿资料去凑合。但对我们对人类社会各种蓝图的了解，可以在我们复原历史时从已知的各种模式中得到启发。近年来甚至有考古学者专门研究现代民族中器物的形态和行为，并把其作为考古复原的参考，我们称这种研究为“民族考古学”。

反过来看，人类学者所观察研究的现代文化与社会，是历史的产物，对它们的了解需要相当的时间深度。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研究现代原始社会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无所适从的苦恼。因为从一方面来说，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原始社会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的，所以他们只好使用各种拟测的方式，根据神话传说来将他们的历史加以复原；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意识到这样复原、拟测出来的历史是缺乏客观基础的。迄今为止，社会人类学者对历史的态度，对研究原始民族的历史的方法，还一直处于犹豫不定的状态中。但是不论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在实践上社会人类学者在对过去的社会的研究上，在绝大多数情形之下是有历史资料的，这就包括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如中国社会）中的历史资料与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如大部分的美洲土著社会、大洋洲社会、非洲大部分社会）的考古资料。即使在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中，他们的历史也可以因考古资料而加强和延伸。换言之，考古学是供给人类学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甚至是主要工具。

根据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对文首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回答，那就是说在“具有中国特色（或任何特色）的人类学”的建设上，是可以有考古学一席之地的。固然在中国传统学科的分类上，考古学与人类学有不同的来